

■ 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丛书

总主编 江 铭 谢长法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CIENT MORALIZATION

中国
古代教化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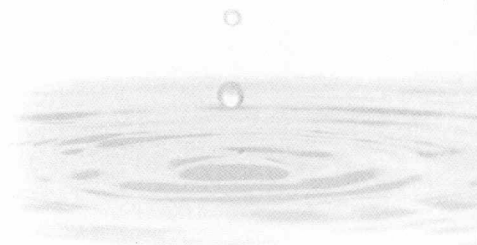
张惠芬 主编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丛书
总主编 江 铭 谢长法

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丛书

中国古代教化史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教化史/张惠芬主编.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9. 5

(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丛书/江铭, 谢长法主编)

ISBN 978 - 7 - 5440 - 3965 - 9

I. 中... II. 张... III. 教育史 - 研究 - 中国 - 古代 IV. G5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8117 号

中国古代教化史

出版策划 张沛泓
责任编辑 郭志强
复 审 刘立平
终 审 荆作栋
责任校对 李爱莲 魏雪萍
装帧设计 薛 菲
印装监制 贾永胜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7号 电话: 4035711 邮编: 030002)

印 装 山西人民印刷厂
开 本 787 × 960 1/20
印 张 9.6
字 数 19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440 - 3965 - 9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 0358 - 7641044

序

foreword

1

加强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是开拓教育史研究的新途径，早在20世纪20年代，著名教育史学家舒新城就曾“将目次拟定，材料集好”，拟就“初等、中等、高等、师范等教育专史”先做系统之研究，“再就各专史而别辑百万言之《近代中国教育通史》”，但终因忙于其他编辑事务，“为时间所限制”，“不能专力于此，只以余暇整理《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近代中国留学史》两册”。^①今天，随着研究条件的改善和研究队伍的壮大，在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中，相辅相成的通史、断代史以及专史都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但就总体而言，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尤其是专题研究仍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组织编写出版《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丛书》就是出于以上认识所做的一次初步尝试。而为了既较为全面地反映中国教育发展的基本概况，又能达到深化教育史研究的根本目的，经过斟酌，本丛书确定从学制系统内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和学制系统外的有关教育两方面组织选题。

对学制系统内各级各类学校教育进行系统的研究，有助于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国教育的历史演变，更好地揭示不同历史时期教育发展的规律和特征。

据传，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即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至汉代，学校教育也得到更快的发展，特别是官学制度，更是为我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经过魏晋时期教育的多元发展，至隋唐、宋元时期，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已臻完备。然而，这种较为完备的学校教育不仅就形式上仅有“小学”、“大学”之分，而且至明清时期，随着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不断加强，也逐渐由繁荣走向衰

^① 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稿选存》，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叙”。

败。历史进入近代，伴随着社会的变革，教育也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从洋务学堂对封建教育体制的冲击，教会学校客观上对中国学校教育近代化发展所起的特殊促进作用，到甲午战争后发展学校教育、广开民智被视为救亡之道、富强之本，以及“新政”期间以建立学校教育制度、兴办新式学堂为中心进行的教育革新，使清末的学校教育在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的冲突中，逐渐抛弃传统，走向近代化。民国成立后，随着“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对封建复古主义思潮的彻底抨击和对资产阶级新教育的大力倡导，随着中西教育交流的不断加强，西方有关的教育理论、教育方法乃至教育制度逐渐被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对传统教育的摒弃和对现代教育的鼎新也加快了步伐。虽然，在这一过程中，湍流急急，步履维艰，但在一大批爱国的教育家筚路蓝缕的努力下，中国学校教育的近代化仍在一步步前进。

学制系统外的有关选题可谓至繁，但基于教育史界研究的现状并尽可能与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相匹配，经过筛选，我们确定以教育史界研究薄弱的古代教化以及女子教育、近代留学教育作为探讨的主要内容。

2 中国自古即重视“教化”，孔、孟的政治主张，即可谓是“教化”的政治，作为一种统治之术，教化的实施不仅仅限于学校范围内的教育设施，而且强调各级统治者从自身做起，发挥表率天下的典范作用，并充分考虑各种政事措施的道德影响和教育意义，通过“广教化，美风俗”，进而强化对广大民众的思想控制，建立起稳固的统治秩序。因此，在古代中国，历代统治者无不充分认识到教化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视之为“大务”和“先务”。无疑，从根本上讲，古代中国的教化政策及其一系列相关的教化形式，是为维护社会统治秩序和纲常礼教服务的，但其中又具有丰富而相对成功的教化理论和实践。因此，科学地总结和正确地对待中国古代的教化传统，乃是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而就女子教育来说，虽然，在古代，女子没有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但一些女子自古就接受着形式不同的各式各样的教育。至清末，由于西方男女平等思想的广泛传播和教会女学的日渐发展，以及西方教育制度对人们的启示，要求女子接受学校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于是，女学像一棵破土而出的鲜嫩小草一样，在世纪之交这个“过渡时代”顽强地生长着；此后，随着女子逐渐在小学、师范、中学、实业等学校教育制度方面取得了法定的地位，小学、大学和中学男女同校也相继得以实现。艰难曲折发展的女子教育成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缩影。除女子教育外，在近代中国，自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通过派遣留

美幼童和留欧学生来培养新式人才，使得留学教育得以兴起后，与社会变迁相适应，留学教育几经沉浮，在不同的时期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和特征，而为数众多的留学生成为变革社会的主力军，其中不少人更是活动于教育领域，成为推动教育近代化的有生力量。

《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丛书》共分九个专题，由九部独立的著作组成：《中国幼儿教育史》（廖其发主编），《中国小学教育史》（吴洪成主编），《中国中学教育史》（谢长法主编），《中国师范教育史》（崔运武著），《中国职业教育史》（谢长法著），《中国大学教育史》（刘少雪著），《中国留学教育史》（谢长法著），《中国古代教化史》（张惠芬主编）和《中国女子教育史》（熊贤君著）。本套丛书以理清各级各类学校教育自身发展的基本线索为中心任务，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中国教育历史的嬗变轨迹。但鉴于各级各类学校教育自身演变的情况各不相同，故对它们的阐述也自然根据其内容的有无或多少而定。如像中学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甚至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都是在近代，尤其是在学制建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所以，有关这些方面的研究我们将侧重点置于近代部分。另外，中国教育史作为一门重要的教育学科，对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在研究中，我们既重视理论性，也强调现实性，以发挥中国教育史应有的服务于社会的功能，增进其普及的效用。整套丛书力求史料翔实，言必有据，结构严谨，观点平实，文字也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流畅。但是，由于辑入丛书的九部独立成书的著作，毕竟出自不同的作者之手，所以我们在写作风格上并不强求完全统一。

《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丛书》由江铭、谢长法主编。参加撰写的绝大部分作者在相应承担的有关内容方面，具有多年的研究基础，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告竣。山西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及有关编辑，特别是张沛泓编审，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我们谨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希望，本丛书的出版能够有助于读者对中国从古代到近现代教育的发展及其规律获得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和认识，并从中总结、借鉴我国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当然，我们更热切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

江 铭 谢长法

前言

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以及和教育手段的紧密结合，这是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统治之术的显著特点，而教化即是这种体制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它与刑罚相对，强调对广大民众进行道德影响，是德治主义的重要体现。

教化思想萌芽于周代，至战国末，形成了理论形式。作为一种统治之术，“教化”一词最早见于《战国策·卫策》：“治无小，乱无大，教化喻于民，三百（里）之城，足以为治；民无廉耻，虽有十左氏，将何以用之？”其中心思想在于说明教化在治民中的特殊作用。其后，《荀子·议兵》中也说，“礼义教化，是齐人也”，同样也是视教化作为一种被统治者所操纵的驯服民心的政治工具。而教化作为一种国策付诸实践，则始于董仲舒和汉武帝。董仲舒在《对贤良文学策》中说：“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汉以后，历代统治者更多试图“以教化为大务”，以达到影响民心、统治民众的目的。

历代学者在阐释“教化”一词时，都注重对“化”的训释。《管子·七法》云：“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教成于上而易俗于下谓之化”。王先谦在《荀子集解》中注曰：“化谓迁善也”，“驯至于善谓之化”。可见“化”，乃是对人们的道德意识行为的一种无形地、不知不觉地“潜移默化”的影响、渗透过程，也就是说，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培育一种淳朴有序的风俗习惯和一个和谐的社会

氛围，让人们生活其中，“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用孟子的话来说，即“以善养人”。故后世学者、政治家提到“教化”一词时，多作此解。

在培育形成良好社会风气的各种途径、措施中，君王、各级官吏和士人的道德表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廉耻》中说：“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主张自君臣至士人，自上而下，一级一级地弘扬道德，推广善行，并将士人有无“美节”、“廉耻”视为教化能否顺利施行的关键所在。由是出发，通过学校教育培养有“美节”、知“廉耻”的士人，便成为实施教化的基本途径之一。董仲舒说：“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① 北宋教育家胡瑗在《松滋县学记》中阐释“学校”与“教化”的关系时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可见，教化与学校教育关系密不可分，两者具有内在的联系。但教化又与学校教育不同，它是一个大教育概念，是主要面向全社会的一种广义的教育，它可以包含学校教育，但与学校教育存在诸多方面的区别。首先，侧重点不同。教化侧重于“化民成俗”，所谓“教成于上而易俗于下”，更直接隶属于政治；而学校教育侧重于人才的培养，所谓“君子有三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其次，内容不同。教化的内容多为仁义道德、礼仪规范；而学校教育除道德教育以外，还要进行文化知识的传授。第三，实施者不同。教化的实施者主要是各级官吏（包括教育官），重在各种社会教育形式的综合运用；而教育的实施者主要是专职的教师。第四，对象不同。学校教育面向青少年；教化则施于全体民众。总之，教化是一种政治、道德和教育三者有机结合的统治术，它的基本特点可概括为：

（一）强调君王和各级统治者、管理者本身的道德典范作用。

（二）强调学校在教化中的核心使用。一方面，要从学校的士阶层中选拔官吏，执行教化任务；另一方面，通过学校培养出来的士人，在全民教化中起示范和榜样作用。

（三）重视良好的民风民俗的培养，强调良好的风俗习惯对民众所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①（汉）班固撰：《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12页。

（四）要求统治者的统治和各种政事措施、策略都要考虑到它们的道德影响和教育意义，引导人们避恶向善。

（五）强调发挥民间的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对人们施与影响。

一言以蔽之，教化就是运用各种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礼仪的、教育的、宗教的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的手段，来影响人们的道德意识、思想行为的形成，从而建立起稳固的统治秩序。由于它具有刑罚所不可替代的巨大功效，故成为中国古代特别是封建社会政治统治的支柱。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 1

第一章 教化活动和教化思想的萌芽

\ 1

第一节 原始社会的教化活动

\ 1

第二节 西周教化思想的萌芽与实践

\ 4

一、教化思想的萌芽

\ 4

二、周代教化思想的初步实践

\ 6

第三节 管子的教化思想

\ 8

一、人性与教化

\ 9

二、政治与教化：“下令于流水之原”

\ 10

三、政治与教化：“申宪令”、“劝庆赏”

\ 11

四、经济与教化

\ 12

五、风俗与教化

\ 13

第二章 先秦儒家对周代教化思想和实践的总结与发展

\ 15

第一节 孔丘的教化思想

\ 15

一、人性与教化

\ 16

二、政治与教化

\ 16

三、经济与教化

\ 18

第二节 孟轲的教化思想

\ 20

一、人性与教化

\ 20

二、政治与教化

\ 22

三、经济与教化

\ 24

第三节	荀况的教化思想	\ 26
	一、人性与教化	\ 26
	二、政治与教化	\ 29
	三、经济与教化	\ 30
	四、君、吏、师与教化	\ 31
第四节	《大学》、《学记》对先秦儒家教化思想的总结	\ 33
	一、《大学》的教化思想	\ 34
	二、《学记》的教化思想	\ 35

第三章 先秦法家对儒家教化论的批判 \ 37

第一节	论人性与教化的对立	\ 37
第二节	论“法”、“术”、“势”对人的控制作用	\ 39
第三节	法家思想对秦代政治实践的影响	\ 43

2 第四章 教化政策和模式的确立 \ 46

第一节	“独尊儒术”教化政策的形成	\ 46
第二节	教化活动的全面加强与教化模式的确立	\ 52
	一、发布诏令，倡导教化	\ 52
	二、行为示范，树立教化榜样	\ 53
	三、确立制度，保障教化实施	\ 55
	四、重用三老，加速教化进程	\ 58
	五、发展私学，促进教化深入	\ 59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教化模式与活动的变异 \ 63

第一节	汉代教化模式的衰败	\ 63
第二节	道教、佛教对教化活动的渗透	\ 67
	一、道教对教化活动的渗透	\ 68
	二、佛教对教化活动的影响	\ 71
第三节	家庭教育在教化活动中地位的确立	\ 74
	一、家庭教育兴盛发达的动因	\ 74
	二、家庭教育的内容及特征	\ 77

第六章 隋唐宋元时期教化思想与活动的复兴 \ 83

第一节	隋唐宋元时期的教化政策	\ 83
	一、隋唐两代的统治策略及其教化政策	\ 83

	二、宋辽金元时期的教化政策	\ 88
第二节	唐代“礼教为本”，推行教化	\ 89
	一、礼制的世俗化和庶民化	\ 89
	二、“礼教”在科举制度中的体现	\ 93
第三节	佛教的中国儒学化及其对教化活动影响的加强	\ 94
	一、佛教经典的编纂和佛教理论的发展	\ 95
	二、佛教成为社会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 96
第四节	科举制度对民风民俗的影响	\ 98
第五节	宋元时期的书院和教化	\ 101
	一、通过御赐图书和院额等形式将书院纳入国家教化体系之中	\ 101
	二、通过讲学活动和德行考核将学生引入、楔入道德的殿堂	\ 103
	三、通过学规的制定和祭祀活动教化生徒为学进德	\ 104
第七章	明清时期的教化政策	\ 108
第一节	明代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及其教化思想之衍化	\ 108
	一、明中前期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	\ 108
	二、明代教化思想之衍化	\ 115
第二节	清代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	\ 120
	一、清初的社会状况	\ 120
	二、清朝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	\ 122
第八章	明清时期教化活动的全面加强	\ 130
第一节	官学与教化	\ 130
	一、明清统治者的重教思想与官学的发展	\ 130
	二、官学教化功能的体现	\ 132
第二节	社学与教化	\ 139
	一、社学的起源	\ 139
	二、明代社学的兴盛与教化	\ 140
	三、清代社学的发展与教化	\ 144
第三节	乡约与教化	\ 146
	一、乡约的滥觞与发展	\ 146
	二、乡约宣讲及其教化	\ 150
第四节	宗族与教化	\ 158
	一、明清时期对宗族制的强化	\ 158
	二、宗族教化的具体体现	\ 162

88 /	第3章 佛教传入中国	二
主要参考文献	98 \ 173	第3章 佛教传入中国
98 /	佛教传入中国	二
后记	178	二
99 /	佛教传入中国	三
100 /	佛教传入中国	四
101 /	佛教传入中国	五
102 /	佛教传入中国	六
103 /	佛教传入中国	七
104 /	佛教传入中国	八
105 /	佛教传入中国	九
106 /	佛教传入中国	十
107 /	佛教传入中国	十一
108 /	佛教传入中国	十二
109 /	佛教传入中国	十三
110 /	佛教传入中国	十四
111 /	佛教传入中国	十五
112 /	佛教传入中国	十六
113 /	佛教传入中国	十七
114 /	佛教传入中国	十八
115 /	佛教传入中国	十九
116 /	佛教传入中国	二十
117 /	佛教传入中国	二十一
118 /	佛教传入中国	二十二
119 /	佛教传入中国	二十三
120 /	佛教传入中国	二十四
121 /	佛教传入中国	二十五
122 /	佛教传入中国	二十六
123 /	佛教传入中国	二十七
124 /	佛教传入中国	二十八
125 /	佛教传入中国	二十九
126 /	佛教传入中国	三十
127 /	佛教传入中国	三十一
128 /	佛教传入中国	三十二
129 /	佛教传入中国	三十三
130 /	佛教传入中国	三十四
131 /	佛教传入中国	三十五
132 /	佛教传入中国	三十六
133 /	佛教传入中国	三十七
134 /	佛教传入中国	三十八
135 /	佛教传入中国	三十九
136 /	佛教传入中国	四十
137 /	佛教传入中国	四十一
138 /	佛教传入中国	四十二
139 /	佛教传入中国	四十三
140 /	佛教传入中国	四十四
141 /	佛教传入中国	四十五
142 /	佛教传入中国	四十六
143 /	佛教传入中国	四十七
144 /	佛教传入中国	四十八
145 /	佛教传入中国	四十九
146 /	佛教传入中国	五十
147 /	佛教传入中国	五十一
148 /	佛教传入中国	五十二
149 /	佛教传入中国	五十三
150 /	佛教传入中国	五十四
151 /	佛教传入中国	五十五
152 /	佛教传入中国	五十六
153 /	佛教传入中国	五十七
154 /	佛教传入中国	五十八
155 /	佛教传入中国	五十九
156 /	佛教传入中国	六十
157 /	佛教传入中国	六十一
158 /	佛教传入中国	六十二
159 /	佛教传入中国	六十三
160 /	佛教传入中国	六十四
161 /	佛教传入中国	六十五
162 /	佛教传入中国	六十六
163 /	佛教传入中国	六十七
164 /	佛教传入中国	六十八
165 /	佛教传入中国	六十九
166 /	佛教传入中国	七十
167 /	佛教传入中国	七十一
168 /	佛教传入中国	七十二
169 /	佛教传入中国	七十三
170 /	佛教传入中国	七十四
171 /	佛教传入中国	七十五
172 /	佛教传入中国	七十六
173 /	佛教传入中国	七十七
174 /	佛教传入中国	七十八
175 /	佛教传入中国	七十九
176 /	佛教传入中国	八十
177 /	佛教传入中国	八十一
178 /	佛教传入中国	八十二
179 /	佛教传入中国	八十三
180 /	佛教传入中国	八十四
181 /	佛教传入中国	八十五
182 /	佛教传入中国	八十六
183 /	佛教传入中国	八十七
184 /	佛教传入中国	八十八
185 /	佛教传入中国	八十九
186 /	佛教传入中国	九十
187 /	佛教传入中国	九十一
188 /	佛教传入中国	九十二
189 /	佛教传入中国	九十三
190 /	佛教传入中国	九十四
191 /	佛教传入中国	九十五
192 /	佛教传入中国	九十六
193 /	佛教传入中国	九十七
194 /	佛教传入中国	九十八
195 /	佛教传入中国	九十九
196 /	佛教传入中国	一百

第一章

DIYIZHANG

教化活动和教化思想的萌芽

第一节 原始社会的教化活动

教化的实践活动是教化思想的重要来源，而这种实践活动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我国的原始社会经历了原始人群和氏族公社两个阶段二百多万年的漫长发展时期。在原始人群阶段，为了维持生存，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和其他的社会成员协力进行生产和生活，原始的教化活动也就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并附着在这种共同的劳动和共同的生活过程之中。到氏族公社阶段，这种原始的教化活动，随着人们知识经验的扩大，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又都有了更大的发展。在氏族公社里，年长的氏族成员肩负着教化的使命，他们是教化活动的主体；年轻的氏族成员则是接受教化的对象。到氏族公社后期，随着作为一种虚构的控制自然手段的巫术的流行，掌握一定的宗教知识且通晓氏族历史传说、图腾崇拜的巫师则更多地充当了教化的主角。

在原始社会里，生产经验的传递及传授，是原始人类教化活动的重要内容。这些经验，既有简单的石、木等工具的制作技术，也有猎取野兽、抗御恶劣自然条件、战胜猛兽侵袭的方法等。由于人类征服自然的本领不断提高，生产和生活经验的日益增多，这类教化活动也日渐丰富，当时诸多的传说故事充分说明了这方面的发展状况。如《韩非子·五蠹》中记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尸子·君治》中有：“宓戏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

《周易·系辞》中曰：“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这些远古传说虽然将生产劳动中的创造发明归功于某一想象中的人物，但却曲折地反映了原始社会劳动人民生活与生产经验日益丰富的情形和当时人们在取火、渔猎、农业等劳动中的原始教化实践活动。

而到氏族公社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生活的逐渐丰富，以及人们的活动更为广泛，认识更加深刻，原始的教化实践活动也较之原始人群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除了在生产劳动方面的教化内容更广泛外，教化实践活动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①生活习俗的教化活动。原始社会没有阶级对立，没有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律及监狱、军队等强制机构，靠什么来调整人们在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的相互关系呢？那就是原始的社会生活习俗。可以说，风俗的统治是原始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氏族公社中，通过共同劳动、氏族会议、吉庆节日、宗教仪式等影响每一个成员，以培养氏族成员接受民主精神的熏陶，具有尊老爱幼、服从指挥、团结协作的品德等。在各种生活习俗的教化中，“冠礼”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形式，作为氏族公社时期一种重要的礼俗，它规定，当男女达到成人阶段（13~20岁）时，必须通过施行庄严的仪式，对这些人员的体力、智力、毅力等进行考验，合格者才可吸收为氏族成员，从而享有与成年人一样的社会权利。可见，通过这种成年礼仪式，不仅训练了青年的意志力，更重要的是使人们在心态上产生了重要的改变。②原始宗教活动中的教化。由于原始人抵御自然的能力低下，在怀着对自然现象神秘感的同时，便产生了对自然物的敬畏和崇拜，日、月、山、川、风、雨、雷、电乃至与农牧业有关的动植物，无一不是原始人崇拜的对象，由此，原始的教化活动深深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在自然崇拜的基础上，进而产生了图腾崇拜，每个氏族都坚信自己的氏族起源于某种物，或者是动物，或者是植物，这个物就是该氏族的图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这些自然崇拜的基础上，为了与自然力对抗而获得生存，他们借助于超自然的神力，借助于想象，以征服自然。所以，为了培养氏族成员对图腾祖先崇拜的情感，出现了各种原始的神话故事，如“女娲补天”、“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羿射九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这些神话故事，作为原始人类征服自然的幻想反映，成为教化活动的重要内容。随着母系氏族为父系氏族所代替，氏族首领在社会中拥有越来越高的权威，当然，这种权威更多的是道德性的，而这种对个人道德形象的崇拜使原始的教化活动发

生了新的变化,使社会管理者个人的典范作用和人格感召力成为影响百姓的重要因素和推行教化的主观条件,因此,原始的贤才标准观念开始产生。在人们看来,贤人之所以能够成就大业,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智慧超群,使政事卓有成效;另一方面在于通过他们的道德典范作用,可使民心归服。除尚贤外,纳谏也是政治举措之一。纳谏的终极目的也是在于知民情,得民心。相传古之圣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①。正是有了氏族首领贤者的典范作用,又加之“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及与民共治的民主作风,使氏族成员听从氏族首领,如影随形,不知“制令”、“刑政”为何物。《商君书》中所谓“神农之世……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②,正是这种景象的真实写照。而《礼记·礼运》更是将当时社会的和谐气氛描绘为“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这种“大同”社会虽然是构建在生产水平极低情况下的一种状况,但它却从侧面反映出这种社会秩序建立的手段是道德主义的。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剩余产品的出现和不断增多,促进了脑体分工的产生,到原始社会后期,开始出现了专门从事教化的人员。据《尚书·尧典》记载:“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所谓“五教”乃五常之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个方面的教化。除司徒负责五常之教外,在当时,还设有秩宗、典乐等官员,其中秩宗负责“天神、地祇、人鬼之礼”,通过这些礼仪之教,宣扬天尊地卑的观念,并用天意来解释等级秩序和有关的道德规范;而典乐则主管乐教,通过教给“胄子”,即天子及卿大夫之长子有关的诗歌舞蹈知识,进而把人们教养得“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③。而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专事教化的机构也开始出现,尽管它们还兼有其他多种非教化的功能。如施行乐教的场所“成均”,敬老养老行礼之地的“庠”,等等。

综上所述,原始社会产生了种种原始的教化活动形式,虽然这些原始教化活动更多的是一些无意识的不自觉的行动,还没有在人的头脑中形成有关的教化观念,更没有也不可能将教化视为一种治国方略和一种自觉统治之术,但是,不可否认,这些原始的教化活动形式,为阶级社会中教化观念的形成和自觉的教化实践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先例。

① 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65页。

② 高亨译注:《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6页。

③ 顾宝田等译注:《尚书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第二节 西周教化思想的萌芽与实践

一、教化思想的萌芽

(一)“以德配天”与“敬德保民”思想的提出

夏商两代的统治之道有两个特点：一是笃信上天，宣扬天命天罚；二是崇尚暴力，讲刑罚而不任德教。然而，正是由于奴隶主贵族的神权恫吓和血腥的杀戮，最终导致了国家的灭亡。

至西周，以周公为核心的奴隶主贵族统治集团，在重视用天命思想证明自身统治合法性的同时，极力强调“敬德”的作用。所谓“王其疾敬德……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①，强调“无念尔祖，聿修厥德”^②。在他们看来，“天命”是有的，但它并不固定，只有具有德的人才可以承受天命，失德就要失天命。正是由于殷的先王能修德，所以天命归殷，后来商纣王穷奢极欲，“不知稼穡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③，“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④，从而最终造成众叛亲离。周王有德，故“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⑤，“乃大命文王”^⑥，于是“天命”归周，周王成了“天之元子”。在周公看来，有德者受命，无德者坠命，要想保住天命，就必须敬德，这就是“以德配天”。而强调“以德配天”，目的在于获得“厥邦厥民”，因此在政治统治举措上，必须“敬德保民”，正如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所说：“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周人“其所以祈天永命者，乃在德与民二字。……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大法胥在于此”。“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提出，标志着教化思想的萌芽。

(二)“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内容

“天命”、“敬德”、“保民”三者统一，或曰宗教、道德、政治融为一体，充分体现了周人对道德作用的自觉和重视。但值得指出的是，周人所提倡的“敬德”、“修德”，只是对各级统治者的要求，“德”在周

① 顾宝田等注译：《尚书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45～148 页。

② 周振甫译注：《诗经译注》，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397 页。

③ 顾宝田等注译：《尚书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72 页。

④ 顾宝田等注译：《尚书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6 页。

⑤ 顾宝田等注译：《尚书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44 页。

⑥ 顾宝田等注译：《尚书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7 页。